

中國天主教報業先驅李問漁

林瑞琪

主曆1911年六月八日，當中國的國民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在上海徐家匯耶穌會的會院，耶穌會士李問漁神父靜靜地辦好總告解，片刻之後，李問漁神父安詳地離開了他所服務半世紀的上海耶穌會，卻留一大筆文化遺產，讓中國天主教會因他的貢獻而自豪。

李問漁神父是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接其間重要的中國天主教人物之一，他與另一位十九及二十世紀天主教名人馬相伯同代，卻不幸（以世俗眼光而言）較馬氏短壽。但李氏在報業、著述、藏書及教育四方面均有重要的貢獻。筆者特別搜集李問漁神父在這四方面的資料，重新整理，以饗讀者。而其中報業方面，更使李氏在歷史上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

根據李問漁神父的墓碑刻記，神父名杕，問漁為字。（《聖教雜誌》，1996，752頁）另據方豪神父考據，李神父原名浩然，號大木齋主。聖名勞楞佐（Laurentius），（方豪，1973，284頁）。方豪筆下的這位前輩如下，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年）生於江蘇川沙西李家，與馬相伯先生良為同教、同學、同年。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陽曆八月十八日加入聖母始胎會，《同登錄》編號為二十六，記年齡十八，疑有誤。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畢業於徐匯公學，入耶穌會修道。（方豪，1973，284頁）

方豪神父的考據指出前人有誤，但方豪神父本身的記載，亦與中國天主教出版界另一位前輩徐宗澤神父記載有所出入。方豪指李問漁神父在同治十一年（1872）晉司鐸。（方豪，1973，284頁），但據徐宗澤神父記載，

一八六五年秋，公（李問漁神父）遣至上海董家渡攻讀哲學，時大修院在該處，哲學在大修院中讀的；共研究二年；哲學畢，即繼續神學，神學第三年完後，即一八六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在郎主教手受司鐸品；翌年神學讀畢，考試優越，得神哲學博士銜。（徐宗澤，1936B，722頁）

基於徐神父與李問漁神父曾為同時代的人，加諸同屬耶穌會，而徐神父有耶穌會檔案可資參考，可信性自較方豪神父之私人摘要為高。一如其他耶穌會士，晉鐸後的主要工作都是傳教或教學。李神父亦無例外。但晉鐸七年以後，開始產生變化，李神父在上海創辦了《益聞錄》半月刊，開始了他漫長而精采的出版生涯。

早期中國天主教報刊

雖然天主教報業起步甚晚，但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卻是大放異彩，其中至為關鍵的人物，莫過於這位祖籍江蘇的耶穌會士李問漁神父。李問漁神父自1879年起，即長居上海徐家匯耶穌會會院，先後創辦了兩份對教會極具影響力的現代報刊。然而，談及中國天主教現代報刊，卻不能不先提遠在華南的香港教區。

天主教自1841年正式傳入香港。但直至1877年，才出現第一份天主教報章“*The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中文名為《香港天

主教紀錄報》。(谷長嶺，1995，52頁)對比起來，其他基督宗教的宗派的成員如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丁韞良(William A. P. Martin)等人來港後不久，即創辦中文報刊《遐邇貫珍》(英文名字為“*Chinese Serial*”)，天主教在這方面明顯落後於人。

天主教會在報刊傳播上的反應緩慢，並非香港天主教會獨有的現象。整個中華大地的天主教會，對報刊傳播功能的重要性，一直不甚重視。事實上，自1582年利瑪竇(Matteo Ricci)等耶穌會士來到中國時起，中國天主教會似乎未有想及出版報章刊物。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谷長嶺教授稱，前述的《香港天主教紀錄報》半月刊，是天主教在中國出版的第一份報刊。(谷長嶺，1995，52頁)換句話說，在這之前的三百多年間，中國天主教會在新聞出版方面，可以說一直在交白卷。(林瑞琪，2003，10頁)

《香港天主教紀錄報》，是天主教香港代牧區所辦第一份報刊，毫無置疑之處，但是否可以算為中國天主教會最早之報刊，則尚存爭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著名中國基督宗教傳播學者羅文達(Rudolf Loewenthal)在1940年曾指出：

在中國最早出版的天主教期刊是耶穌會士在上海市郊徐家匯所出版的《氣象學觀測簡報》。這份科學學報是由天文台於一八七二年所發行，不定期地出版至今。(The first Catholic periodical to be published in China was the Bulletin des observations meteorologiques of Jesuits at Zikawei, near Shanghai. This scientific journal has been issued by the Observatory at irregular intervals since 1872 up to the present time. (羅文達 Rudolf Loewenthal, 1940, p.5)

羅文達所提的天文台，相信是指耶穌會士在佘山所設的天文台，這是當時華東地區的重要天文觀測機構。問題在於，天主教傳教士所設出版的刊物，是否就是天主教刊物，這常是富爭議性的。再者，一份不定期的簡報，在其最早出版時是否能視為一份期刊，這更加值得爭論。基於這兩點原因，我們仍以《香港天主教紀錄報》作為天主教在華新聞事業的開始。（林瑞琪，2003，16頁）

即使這份《香港天主教紀錄報》，本身的對象亦僅限於以英語為主的香港、上海及日本等較為西化地方的教友。（田英傑，1983，127頁）中文報刊方面，上海耶穌會所支持李問漁神父創辦的《益聞錄》及《聖心報》兩份中文報刊，在中國天主教報業的歷史上，乃具有開創先河的意義。

報業出版

李問漁神父在報業方面的貢獻，首推《益聞錄》的創刊。關於《益聞錄》，中國新聞史權威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一書中，有這樣的描述：

《益聞錄》，自光緒四年起（一八七八年）發行於上海，為半月刊，未久改為周刊，由南匯李杅主編。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與《格致新聞》合併，易名為《格致益聞匯報錄》，每星期發行二次。光緒三十四年起（一九零八年），又簡稱《匯報》（原名 *Revue Pour Tous*），而分別出版。《時事匯報》每星期出版兩次；《科學匯報》每兩星期出一次。關於科學問答，由比人赫師慎（Van Hee）任之。次年赫師慎回國，《科學匯報》遂停。此後《匯報》乃成專紀時

事之半周刊。至民國元年，又易名《聖教雜誌》，每月發行，至今存在。（琪按，即一九二五年）此報為基督教舊教（琪按：即指天主教）之言論機關。繼續出版四十餘年。在外人所創辦之雜誌中，當以此為最久。（戈公振，1985，82頁）

至於方豪神父，對《益聞錄》亦有如下的介紹，「（李秋）晉鐸後，傳教六年；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在上海董家渡小修道院教授拉丁文。次年三月十六日，在上海創辦《益聞錄半月刊》。」（方豪，1973，285頁）方豪又引陳百希神所著的「偉大的公教作家——李問漁神父」曰：

當時我國除申報外，沒有其他的報章雜誌，所以李神父創辦《益聞錄》，不但有功於教會，而且還有助於啓發民知，有功於國家。（方豪，1973，285頁）

方豪與戈公振所引的年份有差別，但據羅文達指出，創刊年份應在1879。（Loewenthal, 1940, p.5）羅文達亦提到兩報較少受人注意的英文名字，《益聞錄》是（General News）而《匯報》則是（The Zikawei News）。《匯報》的發行，至1911年因主編李問漁神父的逝世而中止。在其最後一期登有「辭別啓」，內云：

本館創行三十餘年，承諸君青眼頻加，報務日形發達，中間由益聞錄改名格致益聞匯報，改名時事科學匯報，卒名匯報；雖再三屢改，不外乎益聞及科學宗旨也。今本報別有事故，定於七月初一日（廢曆）停版。閱報諸君有專函來到本館褒獎倍至，吊問兼加，注意或改良，或萬不停版者，已有數十起。本館拜讀之下，感愧殊深；無奈停報已經議決，勢難挽回。爰自七月初一日起，從此投筆言別；倘他

日滬上同志諸君，善為組織，另開日報或他報，則諸君翰墨之緣，仍可慶魚水之樂耳。臨別不勝黯然之至。此請大安不一。本館同事諸人拜啓（徐宗澤，1936A，706頁）

無論是《益聞錄》以至後來的《匯報》，對文字傳教的工作均有極大意義。鐘鳴旦、杜鼎克、黃一農、祝平一等人所編《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五）》，收「李公問漁書札」，其中錄有「高麗旬報館主人來書」（2472頁）、「日本中山興來書」（2482頁）、「蒙古韓長風來書」（2483頁），均對《益聞錄》及《匯報》表示欣賞。對於《匯報》的成績，羅文達亦推崇備至，稱其：

主要之宗教內容，為普及與專科文章以至朝廷諭及政治新聞所取代，好能吸引非公教讀者。從此點觀之，可視為成功，發行量已增至三千之譜，在當時屬奇高之列。隨著創報者於一九一一年逝世，報刊亦告停刊，並於稍後以另一形式再度面世。（Popular and scientific articles as well as imperial decrees and political news mainly replaced the religious contents, in order to attract non-Catholic readers also.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paper was successful, since its circulation soon increased to about 3,000, which was unusually high for that period. With the death of its founder the paper was closed down in 1911, to reappear later in a different form.）（Loewenthal, 1940, p.6）

李問漁神父所創辦的另一報章為《聖心報》。對於《聖心報》，方豪神父提及的並不多，只是說了一句：「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年），又創辦《聖心報》月刊。」（方豪，1973，286頁）相反，羅文達對《聖心報》卻十分重視，

耶穌會所出版的三十八份期刊當中，有二十四份在上海出版。在其九份中文的宗教報刊中最突出者，要數《聖心報》，是中國存留最久的宗教期刊，每期發行量達四千四百五十份。(24 out of the 38 Jesuit journals are published in Shanghai. Outstanding among the 9 Chinese religious papers is the Sacred Heart Messenger (聖心報), the oldest surviving religious periodical in China, with a circulation of 4,450 copies per issue.) (Loewenthal, 1940, p.6)

李問漁神父對《聖心報》，似乎有特厚的感情。徐宗澤神父記載《聖心報》的創立過程時提及，

一八八七年公（李問漁神父）又創立聖心報，其第一號出版於一九八七年六月一日，每月出一本，每本共十二張，零售制錢十五文。本報之宗旨，是為恭敬耶穌聖心。公於是年起專管聖心報，龔古愚司鐸接管益聞錄及大修院，但公仍助之。（徐宗澤，1936B，723頁）

其後，李問漁神父接受及辭卻多項職務，唯《聖心報》一直是其工作的重點，未嘗有所改變。僅在1908年至1909年間，把《聖心報》的編務交給徐司愚司鐸，但一年後徐鐸另有任用，李問漁神父又復任《聖心報》及《匯報》的編輯職。（徐宗澤，1936B，723-724頁）

《聖心報》之重要性，不僅在於其發行量及其綿延久遠的歷史，更在於當時創報者的勇氣及決心。十九世紀中期，中國現代報業初興之時，不少教會報章，都避免直接使用「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名義。原因是此等報名在市場上難以接受。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對此有精闢的分析。

《教會新聞》，〔琪按：應為《教會新報》（楊瑾琿等，1985，309頁）〕自同治七年（一八六七年）起，每周發行於上海。林樂知（Young J. Allen）為主筆，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艾約瑟（Joseph Edkins）助之。此報既專言宗教，則銷路自不能暢。故出至三百期時，即易名《萬國公報》（原名 "*Chinese Globe Magazine*"），每月發行，兼言政教。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又增出《益智新錄》（原名 "*A Miscellany of Useful Knowledge*"），為專言科學之姊妹刊。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又增出《中西教會報》（原名 "*Missionary Review*"）為專言宗教之姊妹刊。惟亦因銷路不暢，未幾即廢。至《萬國公報》之體例，亦屢有更變。蓋出資者多教士，主張盡登有關傳教之文字，而普通閱者則又注重時事，故於政教二方面之材料，頗難無所偏重。（戈公振，1985，59頁）

李問漁神父辦報之初，亦不免有此考慮，宗教旗號幾乎毫無例外地成為發行的死敵，所以前述《益聞錄》以至及後更名為《匯報》，都遵循前賢的足印，避危直接提及基督宗教思想。唯獨是《聖心報》的創立，開宗明義以尊崇耶穌聖心為主旨，創立這樣的報刊，必須有超乎常人的決心及魄力，其艱辛卓絕，並非我們今日所能想像。再者，李問漁神父的主編《聖心報》，除了作為一項事工，更有其對聖心虔敬的幅度，徐宗澤神父嘗言，

公所最恭敬者是耶穌聖心；二十四年主編耶心報，在報上宣揚耶穌聖心，令中華全國人民恭敬聖心之心，日益熱切，其功誠有不可沒有；公之編輯聖心報也，常跪而寫作，（徐允希司鐸曾與李公同編聖心報匯報，此係徐公親見之事）故聞有叩門聲，必答曰少待，蓋不欲人見其跪地也；（徐宗澤，1936B，727頁）

徐允希司鐸是徐宗澤司鐸的叔父。(方豪, 1973, 324頁), 又同會並差不多同時, 其可信性當無致疑。《聖心報》於1949年停刊, 歷時六十二年。(顧保鵠, 86頁) 這在當時來說已是一個十分驕人的紀錄。也映照出創刊者不懼艱難, 而得到世人的響應, 其心血並無白費。

著述

李問漁司鐸著作甚多, 到了自言「無年無書」的水平。(陳百希言, 見方豪, 1973, 284頁) 在晚年著作尤多。1903年所撰的《拳匪錄》, 更是當時難能可貴的歷史資料。李鐸晚年亦撰寫了《古文拾級》, 作為震旦學院的中文教材。馬相伯先生在序文中提到:

余同學問漁, 所選《古文拾級》凡百篇, 先今後古, 以其與我並世者今也, 耳目有同濡焉, 自卑自適, 尤合現今之教授, 足為逮古之津梁。學者苟於離經辨志之餘, 仿曾文正分段法, 如呂東萊《古文關鍵》之為者, 將逐節聲調之異同, 句逗之短長, 一一口誦心維, 切以百篇為少而精熟之, 熟則能巧, 國粹之存, 其在斯歟! (馬相伯, 1996, 101頁)

李問漁神父的著作, 不少是從《益聞錄》及《匯報》中長期積累的言論集整理而成。在其致予金緘三司鐸的信中提到, 「擬將歷年益聞錄所登拙論, 刪增潤色, 彙積成編, 顏曰理窟, 上溯主宰奇功, 下述格致要理, 以及彰善禪惡, 易俗移風。」(李問漁, 1996, 2440頁)

在李問漁神父所有著作中, 最重要及影響最深的, 莫過於《新經譯義》的翻譯了。當然, 李鐸的《新經譯義》只是整個聖經中譯的鉅

大工作的進門階，不能以此為滿足，根據年青學者林雪碧的考據，「後來雖有耶穌會士李杓、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卜士傑(Bousquet)等人先後出版《新經全書》、《新經公函》和《默示錄》等書，但馬相伯對這些運作似乎不太滿意。」(林雪碧，2000，12頁)馬相伯的未能滿意是一回事，但李鐸致力聖經中譯之功，則無容置疑。

李問漁神父對同會先輩推崇備至，特別尊崇清代耶穌會士畫家吳漁山，所以在晚年特別為吳漁山整理詩文，編成《墨井集》傳世。史學鉅匠陳垣在「墨井集源流攷」一文中，闡述了李問漁與《墨井集》的關係。

墨井集之名，起於清末李問漁司鐸，漁山不名墨井集也，漁山三十歲前之詩名桃溪集，……

宣統元年，李問漁司鐸乃據「小石山房」本，並將徐匯藏陸編三巴集未刻之聖學詩補入，末附口鐸一卷，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排印，有李自序及馬相伯先生序，其三巴集與陸氏原編不同者，中間刪去二首，卷末又從另本加入四首，是為今本《墨井集》。(陳垣，1985，174-175頁)

藏書

李問漁神父的眾多事工當中，較少人注意到的是圖書館方面的工作。原因也許很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報業出版及在震旦學院的工作，經已使李神父聲名顯赫，蓋過了他在其他方面的貢獻。另一方面，圖書館工作是細水長流的事工，其成績不容易在一時之間看見，因此亦較易為人所忘記。不過，即使教會外的人士，亦對李問漁神父在這方

面的貢獻予以肯定。

其後，徐家匯聖依納爵天主教教堂教士意大利耶穌會理(琪按：諒為「士」字之誤)晁德蒞(P. Zottoli, 1826-1902年)與其助手法國耶穌會士夏鳴雷(Henri Havret, 1848-1901年)、其學生馬相伯、李問漁等具體負責徐家匯藏書樓的藏書建設和發展，熱衷於藏書事業，擴充藏書資源，為藏書樓日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王仁芳，2004，47頁)

據上海的學者黃志偉研究，徐家匯藏書樓的創始人為道光二十二年到滬之法人南格祿司鐸。而奠定藏書樓的基礎者，則是晁德蒞及夏鳴雷二司鐸，二人都是著名的漢學家，著作甚富於溝通中西文化，對藏書樓初創階段他倆頗著功績。(黃志偉，1992，23頁)黃志偉亦提到徐家匯藏書樓與李問漁神父的關係，

然助晁德蒞、夏鳴雷二司鐸發展此藏書事業者，為晁公高足馬相伯、李問漁。馬相伯為世所知，無待介紹，但馬公之管理徐家匯藏書樓則外間鮮為人知。李問漁江蘇南江人，生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零年)，曾創辦《益聞錄》、《匯報》、《聖心報》等，為中國報界之先進，而所著宗教哲學之書尤多，卒於民國元年。繼馬、李二公管理藏書樓者還有沈錦標、徐勵、茅本荃、徐允希、張若虞、張漁珊、楊為時等司鐸主管。」(黃志偉，1992，23-24頁)

黃志偉稱李問漁神父卒於民國元年，相信是一時手民之誤，但李問漁神父對藏書樓的貢獻，得到黃志偉的肯定，則是實至名歸。

教育

李問漁神父在教育方面最顯著的事工，莫過於出任震旦學院院長，這是其司鐸生涯中一件十分顯赫的事件。然而，事件是否出於李問漁神父的自願，抑或是嚴峻形勢下的權宜之計，則值得討論。事件牽涉到法籍耶穌會士與馬相伯先生的紛爭，李問漁神父既終身為耶穌會士（馬相伯則已退會），亦為馬氏的好友，居兩者之間，自有其難言之隱。方豪神父在其《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對這件事的論述頗有為耶穌會諱的意味。

光緒二十九年（一九零三年）馬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法國神父初本義務任教，學校行政，由學生任之，此固馬先生之理想也。至三十一年（一九零五），馬先生微疾養病，外籍教授改革校政，別定規制，違創辦時初意。馬先生為避免師生衝突，率師生另設復旦公學。三十二年（一九零六）震旦學院由李司鐸（指李問漁神父）出任校長，兼哲學教授，仍兼兩報主編。（方豪，1973，286頁）

不過，李問漁神父主持校政的年份，也存在 1905 與 1906 的爭議。據鄭登雲在其所編著的《中國高等教育史》中所說，

翌年（指一九零五），震旦學院在兩江總督周馥，以及一些「不忍其中輟」的士紳張季直、李平書、姚子讓等，「相率致書諸司鐸」，請重新開課。於是，在一九零五年八月正式復課。復校後，院中設董事會，推朱問漁（琪按：當為李問漁之誤）司鐸為院長，南從周仍為教務長掌握全校大權。自此而後，震旦學院全部由法國天主教耶穌會辦理。（鄭登雲，1994，178頁）

即使李問漁神父不是全權掌握校政，但絕非純粹橡皮圖章。前輩學者黎正甫教授在其所著《天主教教育史》中提到，

李浩然司鐸字問漁，與相伯同學。當相伯離開震旦時，經校董會公推李問漁為震旦學院校長，改肄業期為四年。第一年以中文教授，第二年始以法文教授，此兩年名曰附科，至第三年始稱本科，第四年分文理兩科。李氏著述甚豐，辨道的有「理窟」及「續理窟」，並譯著「哲學提綱」，「神學提綱」等書，又編「古文拾級」為震旦學院課本。（黎正甫，1960，364頁）

鄭登雲另外提到，「一九零八年四月，震旦學院由徐家匯遷入法租界盧家灣呂班路（即今重慶南路）。新院舍是在路兩旁購地建築的，因而分成東西兩部。是年，傳教士南從周任院長，改學制為六年，分設預科和法政文學科。」（鄭登雲，1994，178頁）不過，無論接掌校政是始於何時，1908年脫離震旦學院則是沒有爭議的事實，李問漁神父與震旦學院的關係概到此為止。

李問漁神父出掌震旦的時候，經已是六十五歲的老人，面對心愛的耶穌會與數十年相交的老同窗馬相伯之間的種種衝突，其內心痛苦可想而知。前述李鐸所撰的《古文拾級》，仍請馬相伯作序，可見李氏一直希望維持與馬氏的關係。而李鐸在當時亦成為馬相伯與耶穌會保持聯繫的重要紐帶。

鞠躬盡瘁

李問漁神父到了晚年，依然身負多項重要任務，以至積勞成疾，對此，《匯報》有如下的報導：

公主報政，始終如一日，不避勞瘁的。一九一一年六月三日（廢曆五月初七日）午正感冒寒疾，名醫診視，謂無性命危險，但因公年

老力衰，恐有不測。但是日午前猶與副主筆張漁珊司鐸言身後事，喜所譯之書俱竣，不致累續成；惟方刊未刊者則偏勞代校矣。時尚未病，不料所言竟成遺囑。六日兩西醫診視，脈案如前，囑料理身後事，以防意外之變。七日酉刻領受終傳聖事；八日午後四下三刻安逝於徐匯耶穌會院，計在世七十二年。（徐宗澤，1936B，724頁）

然而，同時期的《聖心報》，對李問漁神父的逝世，卻感到似乎有墮於庸醫之手的嫌疑。當時的《聖心報》則寫道：

光緒十二年始創聖心報，至今二十五年有餘，兼管兩館報務；日不停閱覽，手不停披寫，著作等身，不知勞瘁。去年以來，衰疲日顯，然精神尚好，籌理館政如常。本年五月初七日午正，忽患寒疾；初八日降臨瞻禮，停行聖祭，恭領聖禮，尚勉強振刷精神，到大堂內恭望大禮彌撒，至一點三刻之久；由是病勢增劇；初九日名醫診視，稱年老而患重寒熱，恐有性命危。初十日見身上發出紅色斑點，始知變症矣；且寒熱不減，醫甚憂之。十一日傍晚六下鐘，受終傳禮，行禮前公有遺囑數語，自稱感謝天主，賜其死在耶穌會中，已得升天憑証云。又謂三十餘年，常居徐匯修院中，免去外邊犯罪危險，皆天主特恩所賜也。諸位請代為我謝主，可也。言畢恭領聖事。十二日午後兩下鐘，始顯臨終狀，命在呼吸。院長顧公，即誦臨終經文，旁有兩鐸陪侍，為之赦罪誦經。時公明悟尚清楚，旁人與以苦像，即自行口親之，至四下二刻，始不省人事，四下三刻有零，天主召其靈魂升天；計公享壽七十有二，在耶穌會中五十年。（徐宗澤，1936B，724-725頁）

筆者稱李問漁神父為中國天主教出版業先驅，是因為其出版工

作，在整個天主教傳播史上，具有承先啓後的功能。一如筆者前面所述，李司鐸畢生有四大功業，然而，圖書館事業及其教育事業，都只是因應天時的需要，可以由他人所代。著書立說，則是一時之業。唯有其報業事工，前無古人，卻爲後有的來者打開坦途，對於筆者半生爲香港天主教出版業苦幹的晚輩，其意義遠非他者可比。

何時才可以列聖

徐公宗澤爲了紀念《聖教雜誌》出版二十五週年，特於1936年訪問李問漁神父的家屬後人，其後嘗有言：

臨行時，余祝望李府上多男女學生到徐家匯讀書，俾多得修道聖召，以增李公天堂上的光榮，余又請他們多多求主，俾李神父有列品之希望。（徐宗澤 C，731頁）

以李問漁神父的生平功績而言，列入聖品是理所當然的事。問題在於李氏的功績一直爲人所忽略，至今未有人爲他特別寫傳。一般教友對神父的生平茫無所知，其遑論爲其列聖祈禱。

有趣的是，李問漁神父的四大志業，似乎都悉數爲徐宗澤神父所繼承，徐公宗澤，出自上海天主教世家，是徐光啓公十二世孫，其主編《聖教雜誌》凡十四年，主持徐家匯藏書樓，負責指導「啓明女中」及「徐匯女中」，（方豪，1973，324頁）出版各項書籍，中國知識份子，有承先啓後的優良傳統，徐公宗澤，繼承了李公問漁的一切優點，進一步發揚光大，但對前人又深懷感激之情。從徐公的文章中，更能映照出李問漁司鐸對後世的重大影響。

徐宗澤神父期望李問漁司鐸早日列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當時，在今日，都應得到一眾中華教會的兄弟姊妹同聲支持，一同為此熱切禱告。筆者要問的是，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也應該問一句，徐宗澤神父在何時才可以列聖？

附錄：李問漁神父著作及譯作目錄：

根據徐宗澤神父的整理，李問漁神父的著作共二十多冊，（徐宗澤，1936B，727頁）但不在名單中者尚有多冊，現整理如下：

著作名單：

《聖心月新編》、《辨惑卮言》、《砭傲金計》、《天神譜》、《理窟正續》、（琪按：應為兩本書，即《理窟》及《續理窟》）、《玫瑰經義》、《聖體紀》、《德鏡》、《心箴》、《答問錄存》、《忠言》、《聖若瑟月新編》、《彌撒小言》、《奉慈正義》、《愛主金言》、《拳禍記》、《增訂拳匪禍教記》。

譯書名單：

《煉獄考》、《聖母傳》、《宗教大事錄》、《教皇洪序》、《聖依納爵聖水記》、《天梯》、《備終錄》、《三顧問答》、《聖心金鑑》、《亞物演義》、《領聖體須知》、《祈禱會友便覽》、《物理推原》、《默思聖難錄》、《聖體月》、《福女瑪加利大傳》、《真教答問》、《形性學要》、《耶穌受難記略》、《訓蒙十二德》、《西學關鍵》、《潛德譜》、《性法學要》、《福女瑪利亞亞納傳》、《聖日辣爾傳》、《新經譯義》、《生理學》、《靈性學》、《名理學》、

《倫理學》、《原神學》、《天宇學》、《聖安多尼傳》、《公議部奏定婚例》、《默想聖心九則》、《通史輯覽》、《領聖體前後熱情》、《拜聖體文》、《勤領聖體說》。

據方豪神父所稱，上述書目未有羅列的為二，一為光緒二十二年（1986年）編著之《徐文家公集》；一為宣統元年（1909年）編著之《墨井集》。（方豪，1973，287-288頁）但據顧衛民、胡毅華的考証，李問漁神父的著作尚包括《聖留納多自修志》。（顧衛民、胡毅華，1995，261頁）而上述所說的《新經譯義》，應該是後人所指的《新約全書》。一如李問漁神父所說，「無年無書」並非誇張的說法。

參考書目及文獻：

王仁芳著，2004，「徐家匯藏書樓的中外關係史著作珍藏」，收錄於《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通訊》，第十九期，北京，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編，2004年8月。

林瑞琪，2003，《公教報創刊研究 1928-1931》，香港，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

馬相伯著，「古文拾級」，收錄於朱維錚主編，1996，《馬相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林雪碧，2000，《馬相伯與近代中國天主教會本地化的關係》，碩士論文，北京，北京大學。

「李公問漁書札」，收錄於鐘鳴旦等人編，1996，《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五）》，台北縣，輔仁大學神學院。

谷長嶺著，1995，「近代新聞事業的傳入」，收錄於方漢奇、張之華主編，1995，《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顧衛民、胡毅華編著，1995，《使徒足跡——基督宗教傳華全史圖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鄭登雲編著，1994，《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黃志偉著「徐家匯藏書樓」，收錄於《鼎》第十二卷總第七十期，1992 年 8 月，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出版。

陳垣著，「墨井集源流攷」，收錄於，1985，《民元以來天主教史論集》，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戈公振著，1985，《中國報學史》，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

楊瑾琿、寧樹藩、方漢奇、王鳳超合著，1985，「《中國報學史》史實訂誤」，收錄於戈公振著，1985，《中國報學史》，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

方豪，1973，《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第三冊》，香港，公教真理學會。

黎正甫著，1960，《天主教教育史》，台中，光啓出版社。

Loewenthal, Rudolf, 1940, *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 Peking, The Synodal Commission in China.

徐宗澤著，1936A，「二十五週年之聖教雜誌」，收錄於《聖教雜誌》(*Revue Catholique*) 第二十五光第十一期，總第三百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徐宗澤著，1936B，「李問漁司鐸逝世二十五年紀念」，收錄於《聖教雜誌》(*Revue Catholique*) 第二十五光第十一期，總第三百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徐宗澤著，1936C，「李問漁司鐸家屬訪問記」，收錄於《聖教雜誌》(*Revue Catholique*) 第二十五光第十一期，總第三百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天主教司鐸問漁李公之墓碑」，1936，收錄於《聖教雜誌》(*Revue Catholique*) 第二十五光第十一期，總第三百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之 權 版 錄 開 益 辦 創
 鐸 司 漁 阿 李
 年 一 一 九 一 一 一 年 〇 四 八 一

<p>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八月十七日 本館開設上海徐家匯</p> <p>I-WEN-LOU ET REVUE SCIENTIFIQUE</p> <p>格致 益聞 匯報</p> <p>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p> <p>第一號</p>	<p>HOEI-PAO</p> <p>REVUE POUR TOUS</p> <p>匯報</p> <p>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八月初九日 本館開設上海徐家匯</p> <p>光緒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p> <p>第一百號</p>	<p>大清光緒五年二月廿四日 本館開設上海徐家匯</p> <p>益聞錄</p> <p>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三月十六日</p> <p>第一號</p>
--	---	---